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材料

(2021) 第 13 期

---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专题)

2021 年 6 月

## 目录

邓小平、陈云和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伟大开创 .....	1
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 .....	22
改革开放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	29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 .....	3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若干问题述论 .....	42
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史研究维度的思考 .....	63

# 邓小平、陈云和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伟大开创

在改革开放筚路蓝缕的起步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同舟共济、默契配合，他们的思想和意志形成了一种方向一致且互补的合力。这种合力，反映了这一时期党心民心之所向，成为党内的主导力量。也正是这种主导力量，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使我国成功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篇幅所限，本文仅以邓小平和陈云开创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开创对外经济开放新篇章这三个方面作些探讨和阐发。

## 一、开创伟大的历史转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邓小平和陈云在一些重要时间关节点上，有过不少共同的人生经历。这使得他们在开创改革开放道路时，对中国改革的对象具有共同的认识。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陈云二人对实事求是精神就有了深刻认识。1929年邓小平被派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1931年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3年临时中央到达瑞金后，邓小平被作为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毛派分子”，受到排挤和打击。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3年作为中央政治局成员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苏区。

到苏区以后，陈云参与纠正了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经济政策。从那时起，邓小平和陈云就实事求是地站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陈云都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同为我国“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并共同参与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1953年上半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展开，粮食供销全面告急。为保障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安全稳定，主抓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向中央提出统购统销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支持。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陈云两人共同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有关文件。

（1953年10月1日，陈云就改变粮食的现行购销办法问题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嘱陈云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草案）》。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页。）这样的经历，使邓小平和陈云在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时候，都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初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因，始终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956年9月，在筹备召开中共八大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陈云作为副主席人选、邓小平作为总书记人选时，称赞他们是“少壮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陈云是工人阶级出身，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能抓住要点。（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页。）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陈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适应这一转变，陈云在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要在国家统一的计划市场之外允许一定的自由市场存在，明确指出要建立“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邓小平则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分析政党、阶级、领袖的关系，倡导集体领导原则。他们分别从经济体制和党的领导制度上，勾画了我国经济、政治制度进一步

完善发展的蓝图。中共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犯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左”的错误，但会议的这些成果，为重新回归正确道路提供了一条可依路径。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经过拨乱反正，从“左”的路线返回党的正确路线出发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形势进入一个徘徊期。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不顾压力，提交书面发言，呼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30页。）在多方推动下，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正是因为恢复了这些职务，邓小平才得以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为改革开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提出揭批“四人帮”要有个底，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10日，为了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仅限于讨论几个经济问题。会前，邓小平提议，要讨论一下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议虽然接受邓小平的提议，但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想到认真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他接过邓小平的提议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

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但干部群众对党内能否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因而，他建议对几个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冤假错案，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定。（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32-234页。）陈云这一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共鸣。会上继而提出正确看待“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真理标准讨论等一系列问题，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声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

根据会议发生的这一变化，邓小平重新准备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并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一讲话，果断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宣言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为重要成员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正式开启。

## 二、开创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

我国改革起初的突破口，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调节。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的主张虽有侧重点上的区别，但是属于互补性的，在大方向上的主张是一致的。

1979年，邓小平、陈云都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提出了“主辅论”的思想。3月，陈云在思考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写了一份提纲。文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247页。）11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邓小平和陈云提出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左”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拨乱反正。

中共十二大前后，随着改革推进，邓小平、陈云在讲到计划和市场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府计划手段和企业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建设上。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一大批原来隶属中央的企业下放给地方，各地抓住机遇加大本地区投资，搞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而国家用于重点建设的大型骨干项目的资金却捉襟见肘。邓小平、陈云这一时期的讲话，多是为了扭转资金分散的局面，以求加强重点建设。如，1982年1月，陈云发表春节谈话，强调要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09页。）又如，1982年4月，在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



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38 页。）再如，1983 年 6 月，在讨论集中资金抓骨干项目建设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看过去，看过来，要再次肯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原则要坚持，相应地要解决集中统一和适当分权的关系问题。”（《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 378 页。）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陈云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突破。

首先，陈云提出了“笼鸟”比喻论。1982 年 12 月，一方面为了扭转资金分散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妨碍把经济搞活，陈云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提出了“笼鸟”比喻论。他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20 页。）实际上，这个比喻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又上升了一步。所谓把“鸟”捏在手里“会死”，是说原有指令性计划往往把经济搞死，而“笼子”则是对指令性计划的纠偏。这就是主要采用有弹性的间接的“指导性”计划，让“鸟”在宏观调控的“笼子”里按照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自

主地“飞”，实现“活而不乱”。陈云的“笼鸟”比喻论，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指导。1984年9月，陈云从宏观与微观相互关系着眼，强调在考虑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和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时，要“政企分开”，指出：“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412页。）这一意见对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无疑是一种指导和支持。

对于这一《决定》，邓小平、陈云都评价很高。邓小平对《决定》十分赞扬，指出：“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陈云认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将会“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次新的大解放”。（《陈云文选》第3卷，第336-337页。）他还赞成《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认为这“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第337页。）在这些概括中，不但“计划经济”概念被全新界定了，即“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而且“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也发生

了变化，对微观经济直接控制的“指令性计划”完全让位于宏观调控式的间接的“指导性计划”。

《决定》出台后，1985年9月，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值得注意的是，陈云这时所说的“计划经济”的含义已经不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了，而是包含三个部分：一是“指令性计划”部分，二是“指导性计划”部分，三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个新含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既不是以完全的指令性计划部分为主，也不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为主，而是以一种“有弹性的和粗线条的指导性计划”或“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这在市场结构上，与党的十四大上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是相通的。

这一时期，陈云强调加强宏观管理的计划性，是针对当时宏观经济过热和各地重复建设过多的现象提出的，是为了防止在“笼子”没有建好的时候把“鸟”放开，在没有建立起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控制手段的时候，过早地片面削弱中央在计划、财政、信贷、外贸等方面必要的管理权力。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因为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受“适度”通胀来刺激经济“起飞”的影响，在宏观调控上发生动摇，1988年夏，

各地出现了分散投资成堆，货币发行迅速增加，物价上涨的不利局面。10月8日，陈云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3卷，第365页。）据《陈云传》记载，陈云以往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指明了“西方”二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一定是行不通的。（参见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4页。）陈云还强调说：“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陈云文选》第3卷，第367页。）他强调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邓小平提出了“手段论”。他在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时，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1990年，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

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他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把计划和市场归结为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第一，邓小平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属性，而在我国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同样是陈云的一贯主张。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容许搞资本主义或“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邓小平也绝没有否定政府宏观调控、中央权威的作用，相反，他决不容许背离或削弱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后来在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谈话时，邓小平多次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他说：“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

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

邓小平、陈云关于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关于在市场取向改革中不能放弃中央权威的思想，意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能放弃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制度属性。这与党的十四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属性是一致的。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等的共同探索和推动下，我们党在理论上为完成从“计划经济为主”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飞跃，进行了充足的准备。而这一时期的改革实践，也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充分的铺垫。

### 三、开创对外经济开放的新篇章

在对外开放起步之际，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陈云同样配合默契，指引着我国走上了对外经济开放的正确道路。

一是借外债问题。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邓小平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萧条时为资金找出路的时机，借些外债。早在1973年研究对外贸易时，陈云就提出“不

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陈云文选》第3卷，第219页。）的主张。因此，他亦赞成借外债，但强调两点，一是借外债要考虑还本付息能力，要能还得起，有配套资金；二是要对买方贷款和自由外汇贷款等不同形式的外债进行比较，尽可能借一些成本低的贷款。（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249、265页。）对此，邓小平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有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8、199页。）相对来说，邓小平更明确强调要利用国际形势有利的一面，尽可能多借一点外债。但也要求借外债要适当，不要借得太多，尤其要用于发展生产，反对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3页。）

二是出口创汇问题。对外开放起步之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想方设法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是邓小平、陈云的一致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陈云就提出要建立出口生产基地等一系列措施。（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58页。）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要求外贸部转变职能，为本国产品找市场，并要在国外设立外贸分支机构。此外，邓小平、陈云都提议要大力发展国际

旅游业。邓小平鼓励外资、侨资来我国建设旅游宾馆，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65 页。）。陈云提出：“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参见《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37-238 页。）

三是兴办中外合资企业问题。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出访日本期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建议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10 页。）邓小平还提出了请华侨回国投资办厂的想法。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工商界“五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锅，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71 页。）陈云对创办中外合资企业也是支持的。6 月 15 日，荣毅仁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势必会降低外资的投资兴趣。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525 页。）而后邓小平把荣毅仁的信给陈云送阅。陈云在信上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



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 277 页。）

以上三个问题，说到底，就是在对外开放中保持主动和主导地位，增强自身实力，而不能受制于人。

四是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放一系列沿海城市及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问题。实质上，这个问题有三个要点：一是创办经济特区要坚持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二是经济特区要发展拳头产品，从进口型转向出口型；三是创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要维护中央的权威。

先看第一点。对外开放伊始，邓小平大力倡导在广东、福建华侨多的地方试办出口加工基地，也叫出口特区，选了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四个点。1980 年 3 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但兴办不久，1981 年底，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情况，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不良风气。邓小平、陈云都提出要把这股歪风刹住。1982 年 1 月 5 日，陈云把中央纪委一份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等，并写了批语：“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陈云批示中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

抓住不放。”（《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30页。）由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在沿海地区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1月25日，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3卷，第311页。）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如何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会议认为，只有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试办好经济特区。（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4、1559页。）

陈云的意见是，经济特区要办，必须把经济犯罪遏制住。但这一批示却被一些人加以消极渲染。其实，1982年11月16日，陈云就通过秘书作了答复：“我讲过的‘特区要办，但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意见主要是指：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工作的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57页。）

加强党风建设、打击经济犯罪、转变特区风气，也是邓小平的一贯立场。1982年4月13日，按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4月10日召开的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讲话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刹这股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4页。）这一时期，邓小平还在党内发表了大量谈话，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正因为邓小平、陈云合力刹住了这股风，经济特区党风和社会风气迅速好转，随后几年的经济特区建设出现了兴旺发展的局面。

再看第二点。1984年1月22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发展势头喜人。回京后，他约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提出要“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邓小平请人将谈话内容送给陈云。陈云先看了邓小平在视察中和回京后的谈话记录，又听了相关同志的汇报，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

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提议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4月18日，中央书记处对这次会议的纪要稿《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进行讨论，让谷牧到杭州向陈云汇报，听取陈云对《纪要》的意见。4月24日，陈云拿到《纪要》稿后，连散步都取消了，把《纪要》看了两遍，把有关经济特区货币的材料看了三遍。第二天，陈云又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陈云表示同意《纪要》，谈到：“其中有两点我很注意。一是说要有‘拳头’产品。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深圳也没有。但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二是说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问题是让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403页。）

他认为，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是不应该的，但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该提倡的。

陈云没有到过经济特区，这被有的人误解，以为是他不赞成搞经济特区。事实并非如此。1992年4月，陈云派秘书许永跃去广东的经济特区调查，对他说：你去了之后，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你是代表我去的。（参见《晚年陈云与邓小平：心心相通——访国家安全部部长、原陈云同志秘书许永跃》，《百年潮》2006年第3期。）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陈云文选》第3卷，第379页。）陈云的这段话，表明他是完全支持创办经济特区的。

再看第三点。经济特区要听中央的，这个原则不但体现在大政方针上，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实务上。在开发、开放浦东的问题上就是如此。1990年，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建议开发浦东。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9月10日，李鹏到上海看望陈云。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陈云明确表示支持，并强调了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中央宣布上海浦

东为经济开发区之后，全国各地也都纷纷办起开发区来，争着宣布各种优惠政策。要克服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权力”（《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495页。）。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陈云大力支持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4月26日，陈云听取上海工作情况汇报，当谈到欢迎全国各地来上海投资时，陈云说：“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上海大有希望。”他还说：“我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501页。）

陈云不赞成搞经济特区货币也是一例。当时，不少人主张发行经济特区货币。陈云则提出质疑：“特区货币究竟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403-404页。）还提醒说：“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405页。）他建议：“特区货币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是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以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陈云年

谱》（修订本）下卷，第 418 页。）后来，在考虑陈云的建议的基础上，有关部门意识到经济特区货币不那么简单，就搁置了。显然，在经济特区货币的问题上，陈云是把中央的权威和全国金融货币秩序的稳定放在第一位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领导中国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陈云的思想和意志形成了一种方向一致且互补的合力。其所以能形成这种合力，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陈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考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的“实事求是派”（1987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指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9 页。）。他们正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创了引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

（作者赵士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 年第 1 期）

# 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

杨明伟

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在新时代，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这为我们观察思考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两个基本坐标：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两个基本坐标，恰恰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利益，人民的主张就是我们党的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所以，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这就深刻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根本特性，即人



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高度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也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特性。

### 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之间的高度统一性，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内在要求决定的。这种内在要求，至少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高度一致的。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党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每一个决策，既体现全党的智慧，也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是党的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把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他还指出，党和国家决策机关，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任何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群众的心声、呼声、智慧、力量就是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石，也是我们党出政策、作决策的基础。

二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高度一致的。在改革开放中，党的领导越是得到加强和改善，人民群众在推进改革开放中的主体地位就越能得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这就是说，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只是为了党的自身建设，更是为了更好地带领人民前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无论历史进程如何演进，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会改变，党的事业与人民事业的高度一致性永远不会改变。

## 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性是伟大社会变革给出的答案

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高度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实践中，特别是在推进伟大社会变革中探索出来的根本答案。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看，我们之所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个根本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牢记自己的初心来自人民，使命也立足于人民。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

产党人的生存基础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疾苦、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切实问题。正因为我们党这样做了，人民群众就把党的事业与他们的生命连在一起。这种生死与共、血脉相连的关系，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倒的。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胜利时，讲过这样两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这两句话，既讲清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根本原因，也讲清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人民主张的高度一致性，还讲清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看，我们之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党带领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是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其中的一个根本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牢记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倡导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干部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党领导的社会改革任务和一切事业发展，无不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我们党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以及在各

行各业实施的发展规划和建设举措，无不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实现的每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取得的社会发展进步，都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主张的高度统一。

## 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性是改革开放实践给出的答案

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之间的高度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总结 40 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得出来的根本答案。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各个领域改革的全面推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走出的每一个脚步、取得的每一点突破，无不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无不凝聚着人民智慧和党的智慧。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一如既往地人民的主张写进自己的宗旨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做重大改革决策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改革决策时，特别强调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在强调“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时指出，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以百姓心为心”，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这就是我们党决策改革

和落实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我们一切改革实践活动的基点。只要我们事事替人民着想、处处拜人民为师，我们的事业就“灵”。改革开放以来，每到总结历史经验和展望前进道路的时候，我们党都不断强调，时刻不能忘记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没有任何私利，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以权谋私；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决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这些经验总结，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社会实践活生生的反映。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功特别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历史真理。**

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既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初心的一个基点，也是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新时代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应该怎么做，立场在哪里、着力点在哪里、目标在哪里、责任在哪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

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无论改革开放事业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本色都不能有任何改变，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血肉联系的高度统一性都不能有任何变化。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02月20日）

## 改革开放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的高度共识。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波澜壮阔、成就辉煌的改革开放历程值得学术界从多领域多角度加以研究并大书特书。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史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 改革开放史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实践深入而不断发展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史研究在 1988 年改革开放 10 周年之际有了初步意识和成果，在 1998 年改革开放 20 周年之际形成一定规模，在 2008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出现明显高潮并产生一批质量较高的成果，近些年的研究则更加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1988 年有关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论文有 500 多篇，另有 56 种（部）著作出版（含 1989 年出版），其中包括《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十年改革概览》这样的全史型著作。检视改革开放 10 周年之际的研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著述数量最多，在 56 种著作中有 20 种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 10 周年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改革开放史著述，如《十年改革开放之广州》《山东新时期的十年》。这与当时社

会上流传的“南方看广东，北方看山东”密切相关。此外，政治、文教等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相关著作出版。

到 1998 年改革开放 20 周年之际，改革开放史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比如，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期刊部分中，以“改革开放”为主题检索，可以发现论文数量从 1984 年的 3 篇增加到 1998 年的 3300 多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改革开放史著述。单就改革开放史著作出版而言，1998 年共有 130 余种（部）。由于图书出版有一定的滞后性，实际出版的著作应超过上述数量。改革开放全史型著作已不再是凤毛麟角，而是有些竞相争艳的味道了。其中，既有权威机关编纂的改革开放“二十年史”，又有个人以改革开放“历史”或“纪实”为名的著作。在这波研究热潮中，改革开放史丛书的出版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或者分专史如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或者分省如广东、江西、青海等。总的来看，1998 年改革开放史研究已经涉及诸多领域，并且逐步深入，当然重点依然在经济方面。

虽然改革开放 20 周年过后相关研究热潮有所回落，但是自觉的研究意识一直持续了下去，也出现了不少更富学术含量的改革开放史著述。到 2008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时，出现了一个更显著的研究高潮。改革开放史著作出版超过 800 种（部），论文超过 3 万篇。一大批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文献结集出版，各种回忆录、口述实录、亲历记异彩纷呈；一大批以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或类



似命题为名的丛书出版发行；一大批改革开放全史型著作面世，其中较有影响的首推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纂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专题性著述已经涵盖方方面面，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重中之重，但民主政治、法治、科教文卫、思想理论演进、社会变迁、党的建设、外交转型、军队与国防等方面均有研究成果面世；地方和行业部门的改革开放史专著出版成为一大亮点。

历经较长时期的积累和沉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今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改革开放史研究会形成一个更大高潮，产生更多高质量成果。近些年，学者们开始比较深入地探讨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科性质、学术理念、研究体系、理论方法和实践路径等，这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推出高质量成果奠定了更好基础。

### **改革开放史研究形成一些特点与共识**

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时间虽然还很短，但经过一批批学者的努力，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审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大致看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些特点和达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特点，这里仅举两个要点。一是从时间维度看，越是改革开放初期和早期的问题研究得越多越深入，例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改革，关于经济特区，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等。这当然与历史研究本身

的特点有关。二是从研究内容看，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重心和热点，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有关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专著达到 100 余种，是占比最高的。关于农村改革研究更是成果多、质量高。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吻合。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先启动的，而且波澜壮阔、狂飙突进，成就举世瞩目。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的第一声号角，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也促使人们格外关注农村改革历史。

经过长期研究，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史一系列基础性重大问题上达成一些基本共识。比如，改革开放史的主题或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又如，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和阶段划分已经较为清晰，无论是细分还是粗描，有几个划分阶段的历史节点大多数学者是认同的：一个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一个是世纪之交尤其是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一个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改革开放史尤其是历史阶段划分提供了最新的时代视角，从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历史演进并在此基础上划分阶段。再如，有关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及其决策过程已经基本廓清，重要人物的主要贡献、关键历史作用已经有了基本结论，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的源起、演进与发展轨迹、意义

与作用等得到较为充分的概括和分析，一些特定地区和领域甚至行业的改革开放历程及其特点、成就等也有了较清晰的梳理和审视。

### 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综观改革开放史研究，短短几十年能取得如此显著成就是很难得的。但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正视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书写有血有肉有人有故事的改革开放史。已有研究的不少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总是从会议（文件）或决策（政策）到巨大成就，再从新的会议（文件）或决策（政策）到更大成就。这样的历史叙述虽然有始有终，但缺乏过程，或者过程是平面的、直线的，缺乏多线条复合的复杂性展现，尤其是在历史过程中很少看到历史的主角——人，没有故事性。历史叙述应善于通过人和故事反映经济社会变迁、制度体制变动。改革开放史著作应该写得更加生动，这样才能吸引读者。改革开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场感”是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这种现场感对于理解、解释历史至关重要。改革开放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均广泛存在，这为鲜活的口述史、田野调查提供了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不可能有的优势。当下历史学领域倡导的坚持眼光向下、从关注精英到关注百姓，对于书写有血有肉有人有故事的改革开放史亦大可借鉴。

更好发挥资政育人功能。资政育人是史学的重要功能。改革开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史研究尤其要注重资政育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学术界对此有高度共识、充分评价。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历史研究关键是要进一步增强解释力，说清楚这些巨大成就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同时也要看到，历史是复杂的，有波澜壮阔、凯歌行进、辉煌成就，也难免存在各种各样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历史发展进程不可能是一往直前、十全十美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要从有利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以史为鉴提出解决之道，更好发挥资政育人功能。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和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为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此出发，改革开放史研究就更加需要树立全球视野、国际比较视野。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的国际比较、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这一系列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会极大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

注重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当前，对于如何创新研究方法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学界已有很多讨论，并形成许多共识，一些建议很有新意。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上一层楼，需要更多

学者躬身实践新的研究方法。比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心的改革开放史极具复杂性，历史研究者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难度颇大，因而需要多学科合作。目前，多学科学者通过对话与合作协同研究改革开放史还比较少。我们要特别重视形成以重大问题、共同话题为着力点的多学科协同研究。应通过对重大问题、共同话题的共同关注和讨论，打通学科壁垒，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与时俱进。（执笔：杨凤城）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7月09日）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



1980年12月6日，由老战士、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组成的合唱团在首都舞台纵情高歌。两年来，大批冤假错案纷纷昭雪平反，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称其为“第二次解放”！贺延光/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面拨乱反正工作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局面。

### 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度因为“两个凡是”

而推进困难、进展缓慢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工作步伐。

这其中，影响最大、最受人关注的就是平反刘少奇一案。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刘少奇含冤病故，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早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的冤案进行复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求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呼声更加强烈。然而，由于刘少奇一案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尤其是牵涉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此案的平反工作一直未能取得进展。

1979年4月，在邓小平、陈云等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复查工作正式启动。复查组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刘少奇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最终以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此后，因刘少奇问题受牵连的近3万人也得以昭雪。

到1982年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平反、纠正大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47万多名党

员党籍，撤销 12 万多名党员受到的处分，解脱了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实施，使得党和国家由此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迎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400 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

为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这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和解决地、富子女成分问题。

过去，地主、富农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起被划归为“四类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被重点纠察和改造的对象。虽然在“文革”前，已有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被陆续改变了成分。没有办理改变成分手续的，绝大多数也已成为守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蓄意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少已经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遭到迫害。他们的子女，甚至第三代、第四代也被当作地主、富农分子，备受歧视，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都无法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



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这份决定全文不过 676 个字，却直接改变了全国几千万人的命运。据统计，1977 年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 279.7 万人，富农分子 189.5 万人，合计 469.2 万人。至 1980 年年底，全国只剩下地主分子 4 万余人，富农分子 2 万余人。1983 年 7 月到 1984 年 10 月，对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 79260 人，进行评审摘帽。《决定》使得全国先后有大约 440 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有大约 2000 多万人结束了 30 年来备受歧视的生活。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们，终于从“惟成分论”“血统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此外，中央还决定对 1957 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改正。到 1981 年上半年，全国共改正 54 万多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 55 万人的 98%。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 1981 年 11 月，全国共有 70 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恢复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这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调整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为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 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

随着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好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认真全面总结的必要性逐渐显现。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作总结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重要讲话，以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作初步的总结。9月29日，叶剑英的讲话发表，引起党内外广泛共鸣和高度关注，这促使中央作出决定，以《讲话》为纲要，立即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9年11月，《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决议起草工作一启动，邓小平就确立了3条基本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经过近 1 年时间的紧张写作，1980 年 9 月，起草小组交出了 6 万字的《决议》未定稿。10 月，党内组织了 4000 名高级干部对决议稿进行了 1 个月的讨论。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应该肯定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极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对此，邓小平坚决抵制住了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他表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历时 20 个月，数易其稿，经过党内多次大小范围的讨论和修改，《决议》起草工作终于完成。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若干问题述论

郭旭红 武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关键所在。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以更高的经济效益、更低的发展成本和更快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也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效益型、内涵型发展的原因。在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再次面临升级和优化，资源和环境约束更为严峻的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走上效益型发展道路更为紧迫。然而，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变，经济效益没有提高，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发展方式是一个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因此，怎样看待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给予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评价，成为中共党史和经济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 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质上是工业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四化”同步的过程。如果说工业化代表生产力发展，市场化代表生产关系演变，那么二者构成的生产方式变化，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

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这种极为迅速的发展必然是波浪式的、不平衡的，有其不可能跨越的位于初级和高级之间的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长期动态演进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经济部门、新兴的经济部门共同发展的特征。而新兴的经济部门又存在着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并存发展的特征，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大国，既要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又要实行“赶超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共同发展、各得其所。因此 1949 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始终是双重任务：一是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将大量人口和资源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工业，并以此为基础改造农业；二是实现工业内部的高端产业发展，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实现现代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加上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后一个任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作为经济血液和资源配置优化工具的金融业得到空前发展和繁荣，真正表现出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角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

国建立了庞大的货币金融体系来刺激经济发展。截至 2014 年底，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 122.8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 GDP 的 193%。而庞大的货币量供应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金融深化指数 (M2/GDP) 自 1978 年以来，特别是在 90 年代后迅速攀升，不仅超过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在 2000 年以后也高于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金融深化指数 1992 年为 0.90。此后不断提高，1997 年为 1.22，2006 年提高到 1.60，2012 年则攀升至 1.82，在经济新常态下的 2014 年更是高达 1.93。中国货币供给 (M2) 与经济增长有大致相同的趋势，说明货币刺激了经济增长，这已被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实。然而，2012 年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深化指数如下：美国为 0.67、法国为 1.58、英国为 1.61；亚洲“四小龙”中韩国为 1.44、新加坡为 1.38；“金砖四国”中印度为 0.76、巴西为 0.81 和俄罗斯为 0.52。【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14》( <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testpub/gjnj/2014/indexch.htm>) 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1/7、欧盟的 1/5，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70%，居全球第 80 位左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 页。】。这反映了在人均 GDP 较低的情况下，中国金融深化指数远远高于上述其他国家。金融深化过高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导致经

济“脱实向虚”，严重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与上述工业化和市场化快速推进过程相伴随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扩大。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来看，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部门分配的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非常迅速，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的比重上升。1990 年至 2010 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由 53.4% 降到 45.0%。与此同时，合并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反映的企业盈余占 GDP 比重则表现出上升趋势，由 1990 年的 34.9% 增至 42.1%；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稳中有升，由 11.7% 提高至 12.9%。1978 年至 2014 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由 16% 下降到 13%，远低于 2007 年美国 56%、英国 55%、德国 49% 的水平。【1978 年至 2008 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9》；2009 年至 2014 年的数据由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都没有职工工资总额数据，故用《中国统计年鉴 2015》（<http://data.stats.gov.cn/tjsj/nds/2015/indexch.htm>）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代替。美国、英国、德国的数据则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劳动报酬占比下滑与资本占比上升，反映出经济结构变迁中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加剧，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约束强化等问题【参见任保平、钞小静、魏婕：《中国经济增长质

量报告 2013-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年，第 98 页。】。

从微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来看，全国基尼系数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1 年至 1984 年，总体基尼系数较低，在 0.27 至 0.30 之间；1985 年至 1992 年，总体基尼系数较高，在 0.3 至 0.4 之间；1993 年至 2004 年，总体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水平，基本上都在 0.4 以上，其中 1993 年、1997 年仅略低于 0.4【参见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2003 年至 2015 年，总体基尼系数高于全球平均 0.44 的水平，2008 年达到峰值 0.491，而后逐渐回落至 2015 年的 0.462【《2015 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462 创 12 年来最低》，网易，2016 年 1 月 19 日，<http://money.163.com/16/0119/11/BDMJU5R300253B0H.html>】。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变动趋势反映出的状态与基尼系数基本一致。1978 年至 1983 年，中国城乡收入比由 2.570 降到 1.822，之后呈现出逐渐上升态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 2011 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 14832.5 元，城乡收入比为 3.13：1。近年来，虽然采取惠农富农的政策，2014 年城乡收入比仍然较高，为 2.97：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5》相关数据计算整理。】。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不仅影响到投资消费



结构与二元经济结构，而且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导致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持续强化，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 二、劳动力转移与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长期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规模的劳动人口持续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入高效益的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及大量就业人口新增。这种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不仅使就业者的人均 GDP 贡献大幅度增加，而且使得中国可以利用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占有国际市场。这样，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口负担在 1978 年以后就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是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1991 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过 80 年代的迅速发展，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益显著提高，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由 1978 年的 908 元（当年价格）上升至 1991 年的 3326 元，增加了 2.7 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5》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从 1992 年到 2002 年的 10 年，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第二产业加快发展时期。中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任务，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开始从“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转变，推动经济效益新一轮大提高。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由 1992 年的 4070 元升

至 2002 年的 16319 元,增加了 3 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5》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这个阶段可以细分为两个小阶段:从 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为第一个小阶段。由于及时、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八五”时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时期。到 1997 年,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武力:《中国工业化路径转换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从中共十五大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前为第二个小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需求不足开始取代“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外经济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为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开辟了空间;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东部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的第二个大局的帷幕。这些问题的解决提高了经济效益【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年,第 4—7 页。】。

2003 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全面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开始从“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迈入“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沿着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方向不断深化,推动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新一轮上升,赢得了 21

世纪新一轮经济效益的提高。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增幅更大，2012 年中国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为 18928 美元，是 2000 年的 2.9 倍（参见表 1）。

表 1 每位就业者创造 GDP 的国际比较（单位：PPP 法，2011 年不变价美元）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中国	美国	巴西	印度
1991 年	64236	10603	10020	2553	2915	75721	24586	4910
2000 年	77226	12204	11445	2503	6501	91076	25350	6984
2012 年	87824	20855	19233	3290	18928	108350	28952	1371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者创造的 GDP 增长最快，但是 201.2 年每位就业者创造的 GDP 仍然远低于高收入国家。这说明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虽然显著提高，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这意味着中国虽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机遇，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源和市场，但是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多数行业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整体较低。

### 三、经济发展与人文发展指数的变化

人文发展指数（HDI）是综合反映居民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等方面的指数，能够比较全面体现居民所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状况，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性指标【黄玮婷，章贵军：《衡量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中国统计》

2013 年第 9 期。联合国开发署在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定义称：HDI 在 0.50 以下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在 0.80 至 1.00 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时，HDI 非常低。1950 年，该数值仅有 0.225，略低于印度的 0.247。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439 美元（PPP 平价法，以 1990 年美元为基准），远低于印度 619 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9.6%。【*AugusMaddison, TheWorldEconomy: AMillennialPerspective, Paris: OCED, 2007.*】

1950 年至 1975 年，中国 HDI 有了显著的增长。1975 年，中国 HDI 已经上升到 0.523，高于印度的 0.412【胡鞍钢：《中国 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9 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3 年，在世界 187 个 HDI 排名国家中，中国位列第 91 位，比 1990 年提高了 11 位，比 2000 年提高了 5 位。【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04》（<http://data.stats.gov.cn/ztjc/ztsj/gjsj/2004>）和《国际统计年鉴 2015》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1980 年至 2008 年，促使中国 HDI 大幅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预期寿命提高了 0.125，贡献率为 19.6%；教育提高了 0.125，贡献率为 33%；GDP 提高了 0.304，贡献率为 47.4%。综合来说，经济增长对 HDI 贡献最大，其次是教育和健康。2013 年，中国 HDI 为 0.719，接近世界高人文发展国家 0.735 的水平【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15》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有专家测算，2020 年中国 HDI 将提高到 0.878

【胡鞍钢：《中国 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第 99 页。】。这项指标说明，经济增长依然是人类发展指数首要的贡献因素，其次是健康和教育。这说明中国在人均收入相对于发达国家较低的前提下，HDI 已经达到世界高人文发展水平。从分项指数看，1980 年至 2013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由 524 美元提高至 11477 美元，增长 20.9 倍；人口预期寿命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约 8.3 岁和 4.5 年。居民健康、教育、文化素质大幅提高以及 GDP 高速增长对于提高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参见表 2）。

表 2 1980 年至 2013 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分项指标

指标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人文发展指数	0.407	0.452	0.495	0.548	0.590	0.637	0.689	0.695	0.699	0.719
预期寿命（岁）	67.0	68.3	69.4	70.4	71.2	72.1	73.2	73.5	73.7	75.3
预期受教育年限（年）	8.4	8.0	8.9	9.2	9.5	10.5	11.7	11.7	11.7	12.9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3.7	4.3	4.9	5.7	6.6	7.1	7.5	7.5	7.5	7.5
人均国民收入（2005 年 PPP 美元）	524	812	1108	1819	2638	4090	6785	7404	7945	11477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历年相关数据整理。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文发展指数显著提高，从低人文发展国家水平发展到高人文发展国家行列，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总体水平低，而且发展也不均衡。首先，2013 年中国的 HDI 值为 0.719，总体进入“高人文发展国家”行列，但是低于“超高人文发展国家”中美国 0.914、德国 0.911、英国 0.892、日本 0.890 的水平；低于亚洲“四小龙”中

韩国 0.891、新加坡 0.901 的水平；也低于“金砖国家”中俄罗斯 0.778、巴西 0.744 的水平【参见《国际统计年鉴 2014》】。其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文发展指数呈两极分化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的 HDI 远远高于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最发达的京、沪、津与高人文发展水平的葡萄牙相当。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青、甘、云、贵、藏与低人文发展水平的加纳、赤道几内亚相当。

#### 四、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变化

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是反映投资活动中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指标，能够衡量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越高，经济发展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高投资促进高增长，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逐步提高。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技术进步导致折旧加快和沉没增加，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外部成本提高等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效益逐步降低，经济发展质量亦随之降低。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的投资效果系数是 1.56，每百元积累新增加的 GNI 为 35 元，是改革开放前资金利用效果最好的时期。以工业为例，由于该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多，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的产值占 59.7%，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 11%，是 1978 年前最高的时期【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1949—1985 年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219、229页。】。“大跃进”时期投资系数为74.2，每百元积累新增加GNI为1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益最低的时期。1976年至1978年上述两项数值分别为2.38和19元。【张曙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从整体上看，1978年前中国投资效益较低。

从某种程度上说，较高的投资率和巨大的投资规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过度的高投资也导致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转变，降低了投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高投资。1978年至2016年，中国人均GDP由156美元跃升至8028美元，增长了50.5倍；城镇化率由17.9%提高为57.4%，增长了37.7个百分点【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步减弱，资源、环境成本不断攀升，投资效率会不断下降，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1979年至1991年中国ICOR为2.3，高于发达国家中美国1.3、德国2.1、法国1.3的水平，也高于“金砖国家”中印度1.2的水平，说明该段时期中国投资效率低于美、德、法、印度，但是差距较小；由于该时期中国消费投资结构相对均衡，消费率和投资率比值为64.7：35.2。从90年代以来，ICOR不断提高，

投资效率逐渐降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ICOR 是指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该数值越大，投资效益越小。】

1992 年至 2001 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投资增速快、经济过热，ICOR 上升至 4.7，投资效益降低；同期美国、印度的 ICOR 分别为 1.3 和 1.6。加入 WTO 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充分发挥“两个利用”，重化工业的重启以及新型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高投资为依托，带动了高速增长，但投资效果越来越差。该时期消费率和投资率比值为 60.0 : 37.9，与 1979 年至 1991 年相比，投资率上升了 2.7 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了 4.7 个百分点。

2002 年至 2012 年，中国 ICOR 攀升为 7.7，远远高于上述两个时期的 ICOR 值，也超过印度 4.4 的水平。该时期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关系变为 43.8 : 51.6，投资率超过 50%，不符合世界投资率的经验规律。同期，由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提高了投资效益，美国和德国 ICOR 分别降至 0.61 和 0.95。【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2013 年以来，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实现“双中高”目标，中国 ICOR 有所降低，2013 年、2014 年 ICOR 分别为 6.7 和 7.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过程中，城镇化尚未完成，中国 ICOR 高于发



达国家中的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符合中国国情。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 ICOR 变化值，体现了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投资效果，而中国则突出反映作为赶超的发展中国家新型工业化特征。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提质增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经济增长动力要由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未来还需走技术创新之路。

## 五、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从长期来说，科技创新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美）罗伯特·J.巴罗、（美）夏威尔·萨拉-伊-马丁著，夏俊译：《经济增长（第2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7—278页。】。目前，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交融，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抢占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因素，能够综合反映经济发展质量。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极大促进了科技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科技的追赶步伐，大大提高了科技创新能力。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出现了科技创新成果爆炸性增长，一方面促使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动力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存量大幅上升，高素质科技人员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

国每百万人中拥有 R%26D 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其数量由 1996 年的 443 人增长到 2013 年的 1089 人，增加了 1.5 倍。但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到 2013 年，该指标仅是美国的 27%、韩国的 17%、日本的 2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 1996 年至 2013 年中、美、日、韩、意 R%26D 研究人员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到 2014 年，中国创新指数为 46.6，低于美国 60.1、韩国 55.3 的水平；同年，中国创新指数全球位列第 29 位，而美国、韩国分别位列第 6、16 位。这与中国创新产出指数以及研发支出低密切相关。2014 年中国创新产出指数为 47.4，低于美国 52.3、韩国 48.1 的水平。【根据《国际统计年鉴 2015》的相关数据整理。】1996 年至 2014 年，中国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平均为 1.3%，仅仅是美国、韩国的一半。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成为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迫切要求。相关研究提出：到 2020 年中国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为 3%或 2%。【欧盟的《2020 年发展目标》和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分别将 2020 年科技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设定为 3%和 2%。】

科技市场交易与转化、高技术产品生产与贸易推动全球经济稳健增长，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自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呈现阶段性发展态势。1992 年至 2001 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科技市场缓慢发展，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 6.4%提高

到 21.0%，增幅较大，但是年均增速（13%）不到美国、韩国的一半。加入 WTO 后，随着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制度红利逐步释放，促使科技成果转化率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从外部条件看，是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王劲松：《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跨国经济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与开放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87 页。】。2002 年至 2015 年，高技术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年均增速攀升至 27.1%，超过美国 24.2% 的增速，但是低于韩国 29.3% 的增速【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从空间格局上看，21 世纪以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1980 年、1990 年和 2000 年分别仅为 0.03%、0.6% 和 3.7%。进入 21 世纪以来，高技术产品出口突飞猛进，到 2006 年超过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当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则为 16.9%，超过美国 16.8%、欧盟 15.0%、日本 8.0% 的水平。【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97 页。】相关研究表明：这一趋势将延续到 2030 年【参见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第 41 页。】。

1995 年，中国正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参见《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63 页。】

反映了其开始逐步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凸显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的统计显示：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还是中高速发展时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大，由 1998 年至 2003 年的 39.4% 增加到 2007 年至 2012 年的 52.2%（参见表 3）。2003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来说，这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重大突破。而科技创新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2005 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标志着科技创新迈入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正处于“调结构”和“转方式”的关键时期，提质增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至 54.2%，说明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促使传统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是，根据 2015 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全球 149 个国家（地区）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数的测算，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数为 42.9，差不多是美国、日本的 1/2，也远低于韩国 77.1、新加坡 89.9 的水平。在该指数的全球排名中，中国位列第 76 位，而新加坡、美国、日本、韩国分别位列第 10、17、18 和 24 位。【参见《国际统计年鉴 2015》。】这意味着中国要保持“双中高”、实现提质增效目标，科技创新任重而道远。

表 3 1998 年至 2014 年中国分阶段科技进步贡献率(单位:%)

项目	1998 — 2003	1999 — 2004	2000 — 2005	2001 — 2006	2002 — 2007	2003 — 2008	2004 — 2009	2005 — 2010	2006 — 2011	2007 — 2012	2008 — 2013	2009 — 2014
科技 进步 贡献 率	39.4	42.2	43.2	44.3	46	48.8	48.4	50.9	51.7	52.2	53.1	54.2
GDP 年均 增速	8.7	9.2	9.6	10	10.4	10.8	10.6	10.3	11.1	9.3	8.9	8.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5》，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年，第 15 页。

## 六、几点历史启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加上资源和环境的紧约束，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越来越迫切，即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1978 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历史启示。

### 1. 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保障

30 多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历程表明，1978 年以后中国抓住了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第一次是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

集体抓住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契机，将中国引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第三次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改革和发展。历史一再证明：每当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阻碍和困难时，都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来创造条件、促进发展的。同样地，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也要靠改革。

## 2. 科技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步伐，我国的产业结构不仅表现在大量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还表现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快速升级。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成就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7年以后的技术引进和吸引外资，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技术，提高了产业的技术水平。2001年加入WTO后，科技创新机制由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开放过程中技术创新所获得的“外溢”效应和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促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2012年以来，科技创新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今天，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时，如何落实“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将成为中国实现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 3. 完善市场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1949 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存在如何对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1978 年以前，由于面临突破“贫困陷阱”、国家安全等困境，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强化了政府政治动员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保证了高积累、低消费下的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由于取消市场调节和私人投资，也抑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导致了经济发展质量低下和结构失衡。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由“补充”到“共同”，再到“基础性”，直至“决定性”，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 30 多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制度原因。

但是正如全世界都没有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即如何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国在未来发展中仍需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规制、监管好市场；又要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下，发挥政府代表人民的公平正义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该方面的改革在中

共十八大以来呈现出加速的趋势【武力：《1949—2002年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变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实现的，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深化以及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资本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紧迫。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规范市场、稳定经济、调节分配、扩大就业、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宣部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2015MZD00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 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维度的思考

杨德山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的全部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党的领导”（“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在党建方面投入了较以往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为例，书中党建方面内容所占篇幅的比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1.1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1.0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7.80%。】。从党史学的角度看，新时期党史是这一时段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情与理违，目前这类研究成果仅有一部以专著形式由党史研究者完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其他则以中共党史通史的特定阶段史形式出现【在纪念建党70周年、80周年、90周年之际，一批通史性的党史著述集中问世。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根据成书时间，不断延伸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的时间下限。】。这类作品多按党史大背景，以党建重大事件为对象，进行宏观描述、分析和总结。研究者主观上总是力图展现其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史诗画卷，但对党建理论精髓把握的不足、对党

建事件矛盾说明的含糊以及对党建决策实践结果的忽视，常常使他们难以遂愿。从党建学的视角看，适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提炼其经验和启示，在党建研究成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但说明直线化、描述平面化、结论正面化是这类作品的主要特征，宣传色彩浓厚，史学魅力稀见。当然，无论是党史学还是党建学，无论是专业科研人员还是机关研究者，多年来的探索仍然为继续这一专题的探究奠定了基础，至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素材。依笔者浅见，须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历史和现实相承接，或者说“论”与“史”相统一，才能使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建史研究成果更为深刻、生动。所谓“论”，意为从更深层次、更广阔视野认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所谓“史”，意即从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出发，以不回避矛盾和冲突的态度，对待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的发展历程。

### **第一、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要研究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自身建设的发展过程、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其中心命题“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源自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围绕这一问题，中共的党建目标表述根据时势变化先后作

过 13 次调整。但就党的性质规定而言，它从来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政党”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原则要求；就功能定位而言，它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或“领导核心”。1983 年 10 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9 页。】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依然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9 页。】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一直强调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意识形态根据；突出领导核心地位，则是中共在新时期所承担的使命与自身本领之间始终存在张力而提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缘由。换言之，十八大提出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主线，就是中共基于自身性质坚守和功能定位思虑而得出的结论。

无论是性质坚守还是功能定位，都注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一方面，尽管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但是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共同理想的信念、对立党宗旨的执着，是它永恒的立党之本，“革命”是它永远的使命，“革命党”是它终身的名称。所以，中共将“改革”定位为“第二次革命”，现阶段仍宣称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称自己是执政党，只是相对于它曾经作为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而言，与西方政党轮替制度下的“执政党”不可等量齐观【近年来，有些学者将西方“使命型政党”（Missionary Party）套用到中共身上，其实欠妥。在西方，“使命型政党”只是一种以理念而非完全以选票为依归的选举型政党。】。研究者不能套用西方政党转型理论来解释中共历史方位的变化，八个“不忘初心”回应的就是中共“转型”而不“转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无产阶级革命党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过“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其“领导核心”地位未有丝毫动摇。1979年3月，邓小平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列为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之一，并在80年代多次强调它在其中的关键性地位。这一原则还被写进1982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和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成为新时期全党全民必须坚守的政治准则。“领导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二是基本内涵包括政治、思想、

组织三个主要方面，其中至少“思想”领导为西方政党所不具备；三是涉及面为“全方位”“无限制”，即今日所谓“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从功能形态看，那种以政党现代化命题为切入点，套用西方政党政治模式，认为中共将会朝着“国家和社会”之间“中介”方向发展的观点并不正确。

有鉴于此，在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党建史时，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般的“执政党”建设史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领导核心”定位和“革命党”“来路”。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共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建史研究才能有“根”有“魂”。

## 第二、从中国政党政治逻辑角度思考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发展的复杂性

尽管中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作为中国近代政党家族中的一员，它的运行——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党的领导——都难以摆脱中国政党政治逻辑的运行轨迹。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认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所谓中国政党政治逻辑，源自孙中山对甲午战争后中国人从事政党政治活动近 20 年教训的总结。他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要想成功，只能由唯一真正的革命政党来领导；党内必须拥戴“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领袖之所以是领袖，除了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勇气意志外，关键的是“对革命道理，有真知灼

见；对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参见杨德山：《辛亥革命与革命党人政党观的变迁》，《新视野》2011年第6期。】。中共在抗战时期认识和把握了这一逻辑，具体表现为：创建江西根据地的成功，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多次化险为夷到达陕北，全面抗战之初对战争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赢得党内信任、拥戴，最终成为公认“领袖”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系统阐释，整风运动的开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理论指导地位；党员队伍、武装力量规模、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使中共在抗战结束前有了问鼎“中国之命运”的条件。七大文献精神基本展现了中共在这方面的认识结果。从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依循这一逻辑，中共不但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成就。在之后的20年间，尽管中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党没有分裂，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行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逻辑的力量。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四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处于观点提出阶段，以“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面目而出现，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更未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层面。在领导体制方面，干部队伍处于新老交替状态，运行机

制处于新旧转型阶段,人与事、权与责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此外,党内外少数人甚至对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社会影响很大。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等现象,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风波的发生及平息使中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国内,“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在党内,“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310页。】党内的团结一致端赖思想上的统一,中共十四大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完成了这一任务。正因为对中国政党政治逻辑有了新的认识和运用,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13年里,中共领导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取得了“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等辉煌成就【《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页。】。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的10年间,一方面,党领导人民紧紧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经

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页。】；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中治党“宽、松、软”倾向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企图分裂党，窃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关于“野心家”“阴谋家”的表现，参见《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8—29页。】。这从反面验证了中国政党政治逻辑力量的存在。而近年来，中共提出“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力量的强大。

因此，我们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党的建设史时，应该关注中国政党政治的特殊逻辑，切不可套用“传统威权型政党”或“现代法理型政党”或“党一国”体制理论范式来解读新时期以来的中共党建史。否则，便无法理解这一历史存在的真实。

### 第三、正确理解中共执政党的建设规律的内涵

中共领袖群体通常从立党宗旨出发，用“工具论”来阐释党的功能属性。革命年代，毛泽东曾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374页。】。和平时期，邓小平仍强



调，“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218页。】。

在这样的认识传统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理论上对党的建设工作形成了一定的经验性和规律性认识，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特别强调党建工作与政治路线、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的关系。为防止二者脱节，在吸取极左思潮盛行年代“空头政治”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在80年代特别强调：“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到90年代，中共更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统一起来加以考虑，阐明它们与政治路线、中心任务的关联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页。】。二是基于现实社会生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等基础性因素的变化，强调党建工作不断改革的必然性

和必要性。中共在 80 年代就明确提出：“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41 页。】新世纪之初，中共更为关注党建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十六大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不过，在现实党建工作中，不少党委和领导干部曲解了上述规律性认识和要求，或过分强调党建对经济工作的服务功能，将党建基本规律简单化地理解为“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 GDP 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党建工作成就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而视真正的党建工作为中央和上级部署的任务，基本方法就是形式主义地“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或重制度治党轻思想建党，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甚至为了所谓的“创新”将思想建党的传统视为包袱和障碍，蔑视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改革开放时期中共执政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如果忽视了对上述情况的了解，即“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很难发现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由——诸如 80 年代整党活动中上层认识的不一及产生的后果，尤其是不能深入理解十八大之后中共推行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各项举

措的深刻现实背景，也不能深入理解“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这一忠告的深刻理论意蕴。

#### 第四、回归历史学的本来面貌

针对目前党建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认为，既然我们研究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当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中的专门史、专题史问题，那么，遵循史学的基本规范，回归史学的本来面貌，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学术性和科学性。

（一）以所涉问题出现的先后为叙述顺序，而不是以现时的认识结论为据，拔高问题层次，逆向倒推。在目前一些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的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十七大、十八大形成的“一条主线，五个方面”的党建理论和工作格局为叙述框架，将39年党建史分阶段描述，似乎每个阶段这五个方面都同样突出和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反腐倡廉建设”为例，中共只是在十七大才将它单独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个方面加以强调，在此之前均将与其有关的内容置于“作风建设”的范畴内予以说明。如果我们非以十七大时的认识水平和结论强加到此前各阶段，无疑破坏了这一问题本身发展的事实存在状况，如十二大只是要求全党“同生活特殊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作斗争，十四大才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联系在一起予以关注。

（二）注意事件发展完整过程的叙述。大多数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的研究成果在叙述党建事件时，通常表现为“有头”——中央宏观决策、“有尾”——取得了重大成就、“无过程”——没有具体经过。这种叙述往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中央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决策？地方党委、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又是如何执行的？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偏差？遇到偏差又是如何纠偏的？如果每次的结果都与事先的决策要求完全相合，那为什么同样的弊端在事隔数年后又一次重演？只见首尾，不见过程，历史的完整性便被简化，史学的魅力也因此丧失，党建史的学术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建史研究不是会议、活动的文件内容堆砌。与通史式的党史一样，作为专门史的党建史也应该以重大党建史事件和重要党建史人物活动为叙述的关节点和关键点，但由于 39 年来党内政治生活相对平稳有序，不少研究成果的叙述内容基本上就是会议文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的党建工作部署，代表大会期间落实这一部署的中央全会所作出的决议、决定等）的简约介绍，以及一届代表大会期间开展的专门、专题性党建活动的新闻报道内容的相应编纂。至于为何作出部署、怎样开展活动以及这些活动预期的目标到底是否达到等问题，鲜见有人认真依据和运用实证性材料（数据、传记、年谱、档案、口述资料等）进行分析和说明，导致这类研究成果雷同、重复、无味。

（四）改革开放时期党建史研究也存在如何将理论、组织（机关）和活动三者有机结合的问题。党建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活动是重点研究对象。但仅仅作面上的描述，不把人物活动和事件放置于党的组织系统及其运行机制中考察和认识，就难以说明党建的真实历史，就难以理解这些人物活动和事件的社会性质。这些带有特定组织性质的人物活动和事件之所以在一定时间内有其特定的存在方式，还与同时期的党建指导思想密切联系，更与前述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息息相关。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